

#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 学术图景、热点演进及未来展望：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分析<sup>\*</sup>

洪晓楠 翟思羽

---

**【摘要】** 本文通过 CiteSpace 对 1999—2023 年 CNKI 数据库收录的 CSSCI（含扩展版）和北大核心期刊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出包括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热点及聚类、关键词时序演进、关键词突现等方面的知识图谱。根据图谱呈现情况，总结了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现状，梳理了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发展的“三阶段”，提炼了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热点的“四主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不足之处，展望其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相关科研工作者提供行之有效的研究建议，推动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工作与实践研究工作“双提升”。

**【关键词】** 网络意识形态 科学知识图谱 热点演进 风险挑战 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简介】** 洪晓楠，哲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翟思羽，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C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4) 10 - 0023 - 20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原创性贡献研究”（23&ZD004）的阶段性成果。

##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sup>①</sup>因此，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sup>②</sup>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当前我国“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sup>③</sup>的新形势下，我国有关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如何？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研究面临何种现实困境？学者们在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中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突破？这些成为我们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基于科学知识图谱对国内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热点及聚类、关键词时序演进、关键词突现等不同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完整地呈现我国 1999—2023 年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图景，探索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演进过程与研究的不足之处，预测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关注方向，希望为未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提供参考。

## 二、研究设计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如何在海量的科研数据中高效筛选主要研究成果，梳理发展脉络与研究趋势，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科学知识图谱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一种可能途径。

### （一）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基于 Java 环境开发完成的一款文献计量学软件，其研究对象是文献数据。通过对某一领域、某个时间段指定格式的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较为准确地得出这一领域在这一时间跨度中的关键节点和演化路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6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4 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

径，甚至预测出这一领域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动态与趋势，并通过可视化图谱直观清晰地将这些信息展示给研究人员。

##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样本框（2023年7月进行数据结果汇总），以“网络意识形态”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期刊来源类别选中CSSCI（含扩展版）和北大核心期刊，文献检索年限设定为1999年4月至2023年7月，剔除点评类文献，如研讨报告、新闻摘编、访谈、时评等，最后得到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1031篇，这些文章基本涵盖了这一时期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在CiteSpace中将研究的数据时间段定为1999—2023年，时间间隔设置为1年，（c，cc，ccv）的值使用默认设置。

## （三）研究思路

本文立足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现状，分析其不足，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第一，根据国内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历年分布、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展示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图景。第二，结合既有文献，参考关键词时序演进与关键词突现图谱，划分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发展阶段，并据此分析其研究动态。第三，根据热点关键词与热点聚类图，对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热点进行整合，并据此提炼该领域的热点论题，找出当前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不足之处，探索其未来研究方向。

# 三、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图景

根据1999—2023年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整体概况，基本上可以构筑起其学术版图。通过可视化图像分析，观察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总体态势，为探寻其发展趋势奠定基础。

## （一）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发展脉络

若要了解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的整体研究概况，需要厘清其发展脉络，借助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掌握其发展动态。根据CNKI年度发文量绘制出论文数量分布曲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截至2023年，以“网络意识形态”为主题的相关文献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具体而言，在2007年之前，网络意识形态相关文献数量寥寥；直至2007年，有关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文献迎来了第一波稳步增长的小高潮；2014年迎来了第二波增长高潮，并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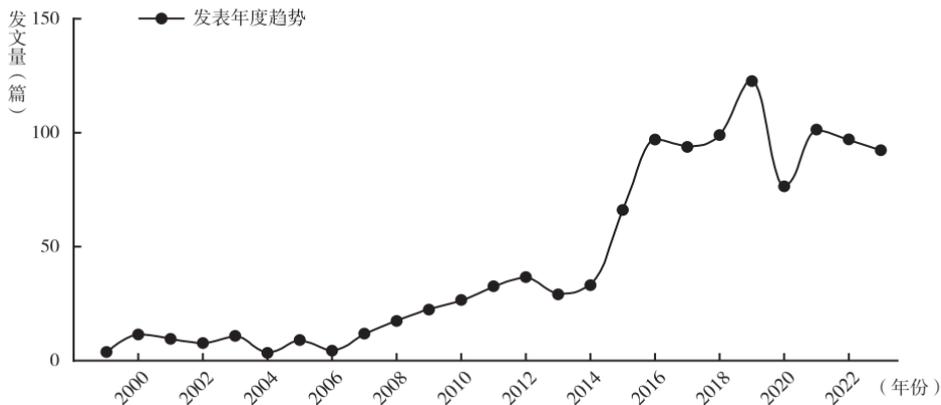


图1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发文章量年份分布

在2017年之后，又出现了小幅度增长，并于2019年达到巅峰，但整体态势基本平稳。

经历史梳理与文献考察后发现，1999年，国内网络产业迎来第一波发展高潮，在网络产业与商业资本的合力催化下，网络逐渐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资本与网络强势共舞，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借网络技术先发之势，行意识形态渗透之事。冯鹏志在其论文中以世界全球化的视角，首次揭底了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的本质，开启了学术界有关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先河。<sup>①</sup> 2007年中国网络界发生了巨变，一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中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问题进行集体学习，“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sup>②</sup>亦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反映出党中央对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微博等网络媒体迅速崛起，突破了传统媒体的一元传播模式，成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平台和途径，微博等网络媒体也由此在民众中间获得极高的声望，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和社会效应。与此同时，网络的舆论聚合合力也催生了网络文化失衡、西方网络文化殖民、网络文化流变、网络环境风险等问题，为学者们提供了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动因。自2014年后，党和政府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关注度急剧攀

① 参见冯鹏志：《“主页”上的“噪音”——关于网络与中国之“链接”的另一种省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4期，第18～19页。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升。在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sup>①</sup>这一经典论断之后，相关部门出台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等一系列管理规定，充分显示了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重视，学者们对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关注度也由此攀升至新高度。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党委（党组）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进一步落实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责任，把党管互联网、党管意识形态落到实处。随后，《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四项细化规定相继颁布，意味着我国网络法治化进程加速演进，这也为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与制度支撑。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sup>②</sup>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sup>③</sup>扩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内容，引导学者们进入网络意识形态建设规律认知的全新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sup>④</sup>的现实要求没有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sup>⑤</sup>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也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下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 （二）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核心作者聚类分析

核心作者是推进“网络意识形态”研究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通过

- 
-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1月26日。
- ③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页。
-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CiteSpace 转化, 得到核心作者基本概况, 如图 2 所示。经统计, 以“网络意识形态”为主题发表高质量文献 3 篇及 3 篇以上的作者共计 28 人, 发文共计 131 篇, 占比 12.7%, 这说明该领域研究成果较为分散, 核心作者集群尚未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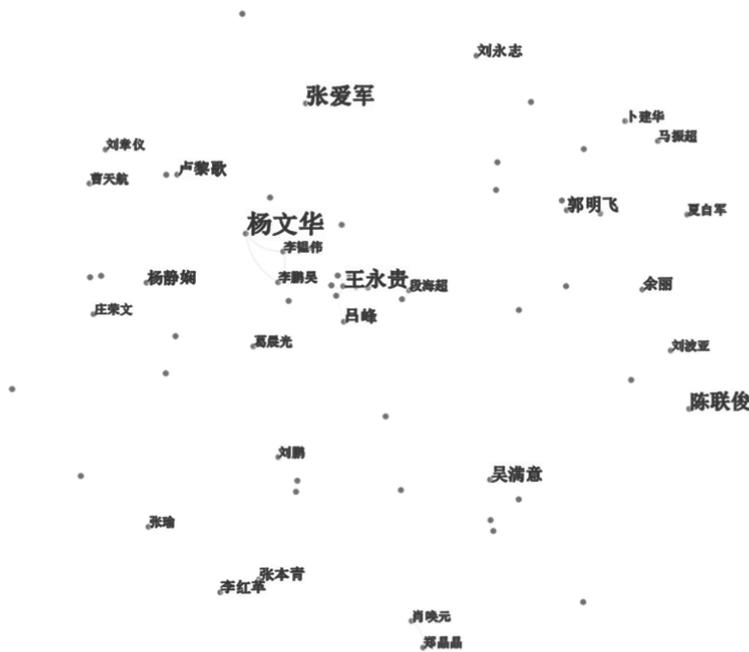


图 2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核心作者聚类情况

### (三)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机构聚类分析

研究机构的排名代表着从事该领域研究人员的分布状况, 经过数据统计分析后发现, 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各高校, 如图 3 所示。据此可以得到 3 个重要信息。第一, 从发文数量看, 截至 2023 年,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表了 12 篇高质量研究成果, 名列第一;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发表 10 篇高质量研究成果并列第二。第二, 高校是从事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主阵地, 其下设的研究所也是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成果产出的重要机构。第三, 整体而言, 文科类与综合类高校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科研成果更多, “双一流” 高校的科研优势更加明显。

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往往不只是研究经验的交流, 更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研究机构实现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共赢的重要方式, 有利于将网络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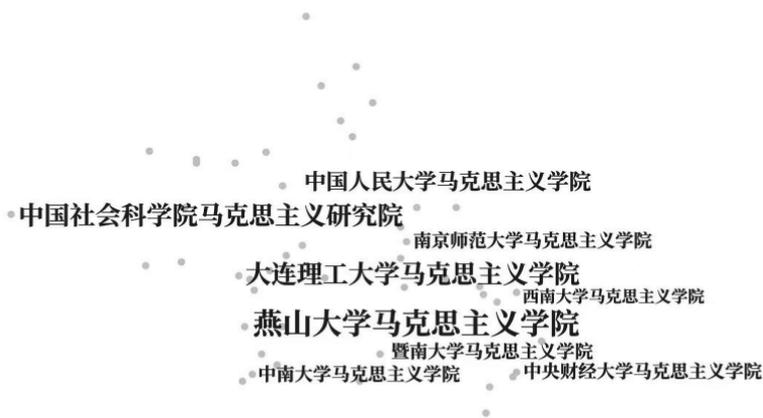


图3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机构聚类情况

形态研究引入更深层次的探讨。例如，工科院校具有技术性研究优势，对网络技术的研究更加透彻；文科院校更加注重理论研究，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容建设更有研究。因此，打破学术研究壁垒，塑造“超专业化”的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有助于不断发掘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新视角，让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更加全面。但是观察图3可知，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结构松散，合作关系并不明显，没有在该领域内形成规模性的科研合作团队，因此，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跨机构交流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 四、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热点演进与热点论题

根据对热点演进、突现词、热点主题、热点聚类的可视化分析，进一步把握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趋向与重点论域，进而深度挖掘网络意识形态主题研究的发展逻辑和变化机理。

##### （一）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热点演进

通过 CiteSpace 的 Timeline 转化得到 1999—2023 年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热点关键词演进图谱，如图 4 所示。图 4 直观地呈现了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热点的迁移过程，根据研究热点迁移的时区划分，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网络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换往往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从热点关键词数量来看，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热点广泛且多样。

对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前沿的汇总分析是探寻该领域未来研究图景的基础，同时通过研究热点的预测分析可以准确锚定未来该领域研究的努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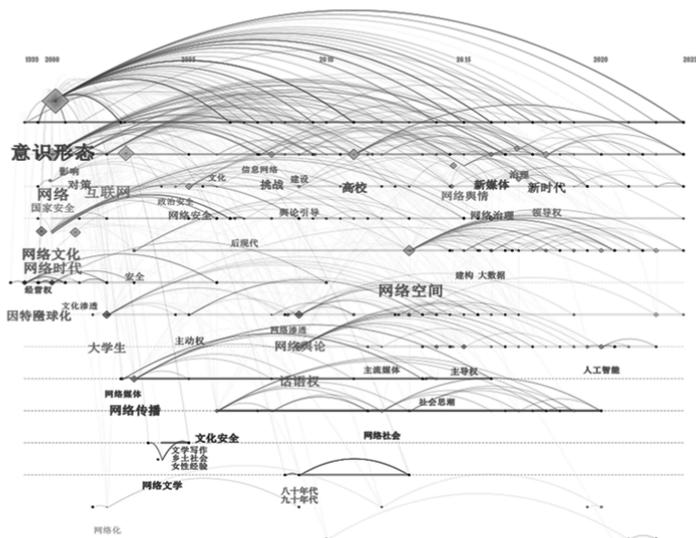


图4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热点关键词演进图谱

向。通过 CiteSpace 的 Burst Detection (突变) 算法功能可以测算出在某一阶段内频次骤增的关键词, 并通过对关键词的突变强度和持续时间来探索一个领域的研究前沿, 突现值越大, 越能展现这一领域的前沿情况, 如图 5 所示。

图 4 直观地反映了 1999—2023 年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热点的迁移过程, 图 5 展示了同期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突现词, 通过对“时序演进”与“热点突现”的汇总分析,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发展经历总体可以分为“突破—深耕—拓展”三阶段。

第一, 1999—2006 年,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处于“突破”期。根据演进图谱与突现图谱可知, 这一时期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主要着眼于网络全球化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循迹可知, 在我国互联网发展的起步阶段, 全球化的互联共通已经基本形成, 西方国家趁机利用互联网的先发优势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国内学者也因此聚焦于网络全球化衍生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其一, 西方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王凤歧等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扩张与渗透》一文中强调了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信息优势, 将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垃圾延伸至世界各地。<sup>①</sup> 其二, 西方国

① 参见王凤歧、林雄辉:《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扩张与渗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第52页。



图5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家利用网络媒介在国际社会中搅弄风云。张新华指出，西方国家利用网络议程设置优势制造国际“信息恐怖主义”，作为危害他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手段。<sup>①</sup>其三，西方国家凭借其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在网络领域中进行文化殖民。王冬梅提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互联网主导权优势，在网络中制造“资强社弱”的文化霸权主义。<sup>②</sup>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信息当作是宣扬其政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无论对内对外，一概牢牢把持信息传播的优势和主动权”，<sup>③</sup>借助互联网全球化的发展大势，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发起不同攻势。因此，国内理论界在这一阶段着重探讨的“网络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等研究热点，其实都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相关联。

① 参见张新华：《网络悖论与国家安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第71~79页。

② 参见王冬梅：《信息网络发展与我国社会主流思想建设的对策思考》，《理论探讨》2009年第4期，第46页。

③ 冯江源、潘正祥：《信息传播全球化与我国国际战略的走向和对策》，《理论前沿》2001年第10期，第22页。

第二,2007—2011年,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进入“深耕”期。在这一时期,学者们紧紧围绕网络文化建设和网络环境建设开展研究。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技术层面、资源层面、信息层面到法理层面抢占全球网络空间制网权,使中国意识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重要性,相关部门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给予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的具体要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战略目标,强调“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要求,<sup>①</sup>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工作指明了方向。所以,此阶段学者们更侧重于深入探求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具体办法,并做出了诸多论述。譬如,徐仲伟提出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建设”主题的研究;<sup>②</sup>田贵平从“提高对网络文化的认知理念”、“大力发展网络文化产业”、“不断丰富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积极改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四个方面提供了网络文化建设策略;<sup>③</sup>杨聪从符号体系建构的角度,针对如何运用网络语言建设并带动网络文明建设做出了详细论述;<sup>④</sup>郭明飞基于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分析,从阵地建设、舆论引导、网民人格塑造三方面提出了网络文化建设的方法。<sup>⑤</sup>由此可见,该阶段学术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面向网络舆论生态优化与网络宣传工作精进等实践方向,这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往往与实践需求相适应的特征。

第三,从2012年至今,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处于“拓展”期。这一时期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与网络信息技术变革相关。党的十八大报

①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4页。

② 参见徐仲伟:《论我国网络文化中的非意识形态倾向与网络文化建设的主题把握》,《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7期,第85~89页。

③ 参见田贵平:《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环境中文化和谐发展研究》,《学术界》2009年第4期,第237~241页。

④ 参见杨聪:《网络符号文化主体与客体》,《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04~108页。

⑤ 参见郭明飞:《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第197~199页。

告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推动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sup>①</sup>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助推了我国网络智能化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更高维度的社会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等高新技术成为推动国家安全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丰富了“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内容。但是，算法黑箱、“信息茧房”、技术脱钩等网络技术问题衍生的算法伪舆论、媒介孤独症、媒介焦虑症等意识形态问题，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挑战。因此，学者们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等网络高新技术与“治理”相结合，作为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前沿热点。基于此，学者们抓住现代网络技术的独特优势，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嵌入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之中。综合来看，网络技术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参与，大抵可以分为三个方向。一是网络技术参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网络信息技术是话语权建设的基础和支撑”，“过硬的技术实力则能够有效防范网络侵扰，并且利用信息采集和处理等技术构筑意识形态防御网，助力网络空间治理，守护话语安全边界”，<sup>②</sup>同时“通过优化技术系统，破解‘官方’主流载体和‘民间’非主流载体统筹协调的难题是网络话语权把控的基础”。<sup>③</sup>二是网络技术参与网络舆情防控。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舆情引导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以及规律性，<sup>④</sup>网络技术作为专业的“第三方治理主体”，<sup>⑤</sup>能够“精准地绘制出‘舆情画像’……不断加强意识形态舆情的预测预警与分析研判”。<sup>⑥</sup>三是将具体的网络新技术嵌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例如，杨章文探讨了“将元宇宙技术嵌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正向效应”；<sup>⑦</sup>谢俊从5G技术赋能和传播要素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② 吕峰、王永贵：《提升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路》，《理论探索》2022年第4期，第63页。

③ 农毅：《加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网络话语体系创新探究》，《学术论坛》2016年第5期，第169页。

④ 参见赵雪：《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舆情引导机制论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01页。

⑤ 李辉源：《基层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提升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0期，第198~203页。

⑥ 赵雪：《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舆情引导机制论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01页。

⑦ 参见杨章文：《元宇宙技术嵌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双重效应及其调节优化》，《探索》2023年第1期，第171~184页。

角度出发,提出用5G技术驱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破解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力式微的难题。<sup>①</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sup>②</sup>虽然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稳中向好,但随着“两个大局”的加速演进,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不断加深,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不断衍生出新考验,也对接下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二)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热点论题

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高度凝练,热点聚类能大致描绘出该领域研究的轮廓,二者是我们提炼热点论题的重要依据。

### 1.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关键词共线分析

将1999—2023年以“网络意识形态”为主题的1031篇文献的关键词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数据转换,绘制出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如图6所示。

据数据统计可知,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热点关键词共有1228个,数量较多且分布较为分散。首先,“网络文化”“网络舆情”“网络舆论”都是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的生成诱因;其次,高校是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关注场所,大学生群体是重点关注人群;最后,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应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对策。总体来看,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主要与安全相关。

### 2.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指对关键词进行的分类与整合,是研究热点论题的折射。由图7可知,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关键词聚类主要分为“意识形态”、“网络”、“互联网”、“网络文化”、“网络空间”、“因特网”、“网络舆论”、“话语权”和“网络媒体”。结合聚类主题、主要关键词和聚类图谱,可以将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大致分为“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研究”、“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研究”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四个热点论题。

第一,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研究。目前,我国学界对此主要有体

<sup>①</sup> 参见谢俊:《5G驱动下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应对策略》,《探索》2022年第6期,第173~184页。

<sup>②</sup>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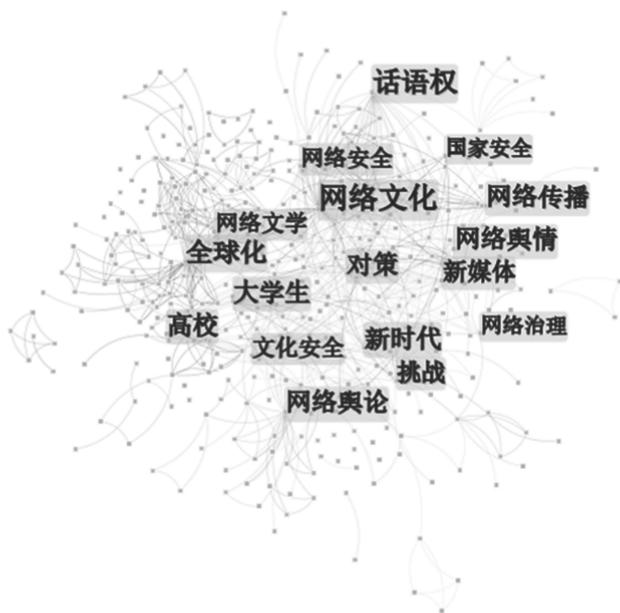


图6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图7 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热点聚类知识图谱

系论、延伸论和价值论三种解释。其一，体系论大多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将一定的思想观念融入网络技术而形成的体系。例如，郑洁将“网络意识形态”定义为“网民看待网络世界的有机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指导网民的‘行动’，并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sup>①</sup>黄冬霞等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借助数字化符号化信息化中介系统而进行的信息、知识、精神的共生共享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系”。<sup>②</sup>其二，延伸论将网络作为意识形态延伸与扩散的场域，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在网络发展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延伸。例如，赵惜群等指出，网络意识形态是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表现方式和传播形式；<sup>③</sup>卢黎歌等提出，“网络意识形态是以网络为载体产生的意识形态新领域，是传统意识形态从现实向网络延伸的网络化生存现象”。<sup>④</sup>其三，价值论立足于理性与感性的逻辑递归，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理性中的感性，是以数字形式展示的一种价值信念。例如，谢玉进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就是适应网络社会变迁，在网络空间中以数字化感性展现为主导形式的，以广大网民为对象言简意赅且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sup>⑤</sup>总体而言，学者们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研究更着重于强调网络载体的工具价值，从网络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来阐释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但缺少将网络意识形态作为本体进行理论阐释的文献。

第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该主题包括“话语权”、“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等关键词。目前，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被网络技术和资本力量影响。一方面，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技术特质打破了传统传媒体制对话语生产、传播资源的管控，“为话语自由实现提供了极大空间，使传统的话语权威遭到严重的解构”。<sup>⑥</sup>另一方面，网络的资本化使网络意识形

① 郑洁：《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综述》，《新疆社科论坛》2010年第5期，第74页。

② 黄冬霞、吴满意：《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新界定》，《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8页。

③ 参见赵惜群、翟中杰、黄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内涵解读》，《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1期，第40~42页。

④ 卢黎歌、岳潇、李英豪：《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博弈与引导》，《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6期，第75页。

⑤ 谢玉进：《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3期，第59页。

⑥ 肖唤元：《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思想聚焦、范式局限及未来展望》，《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37页。

态生产“物化”倾向严重，严重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威，<sup>①</sup>为“反马”“非马”等错误思潮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针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学者们深入探索，寻找解决方案。例如，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作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对象，提出“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建设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sup>②</sup>“将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影响”，<sup>③</sup>通过走网络群众路线，保证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动权。还有学者对话语权做出划分，提出“从话语体系、话语能力、话语内容上着手，牢牢掌握话语权”。<sup>④</sup>综观诸多观点，学者们认为掌握了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会赢得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经成为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

第三，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sup>⑤</sup>关键词共线图谱与关键词聚类显示，“网络舆情”与“网络舆论”是风险类别的高频词，也是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来源的主线。“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sup>⑥</sup>国内网络舆情事件与国外网络舆论攻击共同影响着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网络技术先发优势和国际舆论主导优势，在国际和我国国内不断恶意制造网络舆论混乱。其次，网络牵引着国内多种舆论的合流、交织、共振，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指数。金伟等结合国内发展矛盾，指出“一些社会失范现象、结构性难题逐渐暴露，社会不满情绪通过开放性的互联网平台释放、蔓延，并形成网络负能量”，<sup>⑦</sup>这些网络负能量舆论的肆意发酵，阻滞人们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最后，在资本逐利的驱使

① 参见赵丽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第78~85页。

② 参见涂雨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经验》，《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年第22期，第9~13页。

③ 陈联俊：《人民至上视域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4期，第145页。

④ 聂智、肖皓文：《“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8期，第29页。

⑤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页。

⑦ 金伟、白舒娅：《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特点及防控策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4期，第61页。

下,一些人为实现个人意志或者获取更大利润,“用资本俘虏网络传媒从业者的思想,从而间接操纵影响国内网络舆论”,<sup>①</sup>用舆论假象塑造出看似迎合受众价值偏好的“信息茧房”与“信息孤岛”,让群众在“回音室效应”下被失真舆论洗脑,形成资本操控下的“网络民意”,助推资本价值的实现。总而言之,在国内外网络舆论的夹击下,如何保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不动摇,是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重要内容。

第四,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研究。从关键词共线图谱与关键词聚类中可以发现,“网络治理”与“对策”等关键词对应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重点。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连,在关键词共线图谱中“网络安全”“文化安全”“国家安全”作为高频词汇出现就是最好的佐证。“在信息时代,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同许多其他方面的安全都有着密切关系。”<sup>②</sup>一方面,网络意识形态事关国家政治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sup>③</sup>说到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根源于异质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的斗争,究其根本,依然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权之间的强烈对抗。另一方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已经转化为综合性风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sup>④</sup>具体而言,在网络赋权的传导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不断叠加、演变、升级,已经牵涉多重领域。李洁等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牵涉的领域大致概括为:国家主权、民族安全、宗教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环境、组织个人合法权益。<sup>⑤</sup>因此,能否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直接关乎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稳定,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治理迫在眉睫。史献芝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作为整体性

① 杨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中的资本逻辑批判》,《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第82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09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4页。

④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⑤ 参见李洁、周毅:《网络信息内容生态安全风险:内涵、类型、成因与影响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22年第5期,第5页。

论题，主张塑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内在理论自觉，进而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自觉，因为“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仅仅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视为一个技术层面的实践问题，而是早已将其定位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和实践内容”。<sup>①</sup>由此观之，无论是从国家战略高度还是从社会现实角度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对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国家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值得学者们持续关注和探索。

## 五、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未来展望

由学界研究的发展脉络可知，国内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近些年该领域高质量文献的产出也相对稳定，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具有巨大的、长久的研究价值。“科学与思想革命是结伴而生的”，<sup>②</sup>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进行，也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新追问：对理论界而言，在原有知识体系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研究需要在哪个方面继续深化，才能为数字技术背景下的思想革命打牢基石？对实务界而言，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在哪个方面继续完善，才能填补当前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实践空缺？

第一，通过梳理国内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文献可知，未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研究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深耕。一是理论概念研究应该继续深化。当前我国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性成果主要是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意识形态建设（含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进行理论阐发，缺乏从认识论的意义维度将网络意识形态作为本体进行阐释的相关研究。应加强网络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系统性阐述，深耕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的哲学追问，将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防止网络意识形态研究陷入纯粹唯物主义者“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sup>③</sup>的研究困境中。二是研究对象范围需要拓展。既有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对象主要聚焦于高校群体与新媒体行业等特定群体，

① 史献芝：《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路径》，《探索》2018年第4期，第175页。

② 杨扬：《在技术革命与思想革命之间——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新文科建设》，《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第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缺乏对其他人群的关注。当前，“互联网+社交”“互联网+内容”“互联网+利益”等模式催生了一个个不同的“情感共同体”，组成不同的网络文化圈层，各个圈层的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各不相同。这就需要科研工作者始终关注网络圈层分类，推动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更加全面化。三是研究视域需要拓宽。从现阶段看，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文献较多，但在经济建设视域下的研究文献较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sup>①</sup>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在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新时代数字经济催生了众多网络新职业，不断重塑传统的生产关系。但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使区域差异性更加突出，一些落后地区由于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备，无法适应数字化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sup>②</sup>因此，网络意识形态研究还需要格外注意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找寻破解落后地区的社会意识与现实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问题的方法。

第二，通过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热点演进与热点论题分布图可以发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贯穿于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发展脉络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问题是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2020年之后，“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网络治理”等关键词开始突现，有关“‘人工智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研究成果急剧增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该类研究成果多从技术应对或风险防范等外部变量视角提出相应维护措施，更专注于通过优化网络技术和升级网络应用等方式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缺乏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内在结构变化的探讨。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更加侧重于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在变化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问题，尤其要回应时代关切，将理论内涵置于重要历史节点的变化中加以考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在信息时代，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sup>③</sup>所以，学者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不仅要结合国内网络安全技术应用现状，也要关注当前网络意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568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09页。

意识形态的内在变化，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内在变化与外部风险防范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以“有组织科研”推动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持续深入。由前文可知，高校是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阵地，但是研究成果突出的高校更倾向于在“网络意识形态”的某一领域持续深耕，高校之间缺少合作联动，没有形成“科研共同体”。当前，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面临研究资源分散、文工交叉较弱、技术困境难以突破等问题，高校之间单打独斗的研究模式难以为解决网络意识形态研究问题形成有效支撑。为此，可以借鉴《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出的解决方案，“以有组织科研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创新”，<sup>①</sup>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中对此做出详细介绍，即有组织科研应该“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学校学科优势为基础，研究提出有组织科研的主攻方向，明确主要任务和战略目标”。<sup>②</sup>由此观之，以有组织科研形式推动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继续深入，首先要聚焦国家的大政方针与社会现实需求，保证科研目标清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sup>③</sup>这一重大论断向高校科研团队明示了下一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划，概括了未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关注方向。其次，发挥学校学科优势，科学规划科研布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是全方位、多维度的，各高校在从事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各自办学特点和学科优势，融通各路资源，凝聚形成研究的创新合力。一方面，要加强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现有研究优势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各自的优质科研资源，齐心协力、取长补短，共同攻克网络意识形态研究难题，促进更多创新成果的产出。另一方面，推动形成“文理交叉”“文工交叉”的有组织科研联动，探索网络技术攻关与网络思政教育合璧的“网络意识形态综合治理体系”研究成果。

① 《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人民日报》2022年5月28日。

② 《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http://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8/t20220829\\_656091.html](http://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8/t20220829_656091.html)，2024年8月20日。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第四，以“三大体系”建设带动网络意识形态的理论阐发，为新时代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工作提供方法论支撑。由前文可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主要以国家大政方针为指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sup>①</sup>因此，将“三大体系”纳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建构中，不仅可以为网络意识形态学术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分析思路，而且可以为新时代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其一，网络意识形态是一种复合型概念，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复合型安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跨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对相关学科具有较高的系统创新要求”。<sup>②</sup>因此，网络意识形态的学科体系建设要坚持以大学科的视野推动学科交叉，不断纳入新的学科分支（如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又涉及国家安全学、网络空间安全学等综合性学科）。其二，既有研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角对网络意识形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未来应继续拓展学术视野，形成多元知识交叉的学术体系。因此，未来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支撑，加强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团队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构建全面、客观、立体的网络意识形态学术研究体系。其三，由前文可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属于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各学科性质不同、思路不同、范式不同，很难形成一致的话语体系。有学者认为，“话语体系建设是学科体系建设和学术体系建设的检验标准，也是学术前沿活力的呈现”，<sup>③</sup>因此，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必须破解各学科性质不同、思路不同、范式不同的现实难题，加强各领域内权威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将各学科研究的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融会贯通，加快打破各学科之间的话语壁垒，形成统一规范的话语体系。

（责任编辑：王兴辉）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李栗燕：《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技术模式探析》，《学术界》2018年第8期，第156页。

③ 王林：《我国国家安全学“三大体系”建设再思考》，《情报杂志》2022年第10期，第67页。